



随感

“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明末李自成起义军重要将领），我劝你们不要学。”1950年2月，毛泽东同志从苏联访问回国，看到哈尔滨、沈阳招待的饭菜很奢侈，生气地说：“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郑重地向全党全军提出“两个务必”的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等六条没有写进决议然而又十分重要且具体的规定。亲自提议、躬身践行，以身作则、走在前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始终是优良党风的实践者、示范者、引领者、推动者。

东汉学者班固在《白虎通·三教》中说：“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营造一种风气，提倡一种追求，引导一种方向，历来是上有所行、下有所效。领导干部处于“上位”，率先垂范、从己做起，是无言的要求、无声的号召、无形的榜样。正如习主席强调：“必须领导带头，以上率下。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

以上率下，关键在“率”。《诗经·小雅·采芑》中有句话叫“方叔率止”。这里的“率”通将帅的“帅”，演变成带领军队行军的意愿。《论语》有言：“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揭示了领导者的行为示范具有重要的风向标作用。

领导者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权”字的繁体字是“權”，由“木”旁和“瞿”字组成。“木”象征手握权杖的人，“瞿”字既有“观察”之意，又象征鸟嘴的形状。两者结合起来，有一种含义是指手握权杖的人，像鸟嘴一样自上而下地劝说、影响他人。在作风建设中，领导干部处于主导地位，理应自上而下、以上带下，立好样子、作出表率，形成“头雁效应”。

常言道：“上有所率，下有所进；上有所行，下有所仿。”改进作风本身有个逐步立信、上行下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虽然在数量上是“少数”，但在发挥作用上却很“关键”。“上头”模范带头、言传身教，多在前面带动人，“下头”就能学有榜样、做有标准、有目标，进而激发“群雁活力”。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苏区干部“十带头”的歌谣》唱道：“苏区干部作风好，事事走在人前头。学习军事他带头，参军作战他带头，执行任务他带头，节约粮食他带头，遵守纪律他带头，参加劳动他带头……”正是一个个“带头人”，带出了苏区优良作风，带给了群众

■左立东

上为之，下效之

信心与希望，带来了革命光明前景。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编写《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在总结的六条经验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这是实践的结晶，也是深刻的启迪：抓住了“上头”，才能抓住正风气、严党纪的大方向和“牛鼻子”，改进作风才能有强劲推动力、强大感召力。

我们常说，“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这里的“看”，主要是看党员领导干部是不是言必信、行必果，走在前、干在前。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只要“子帅以正”，身体力行、埋头苦干，群众自然会赞许你、拥护你、追随你；反之，如若“上梁不正”，不务正业、骄奢淫逸，群众难免会疏远你、痛恨你、反对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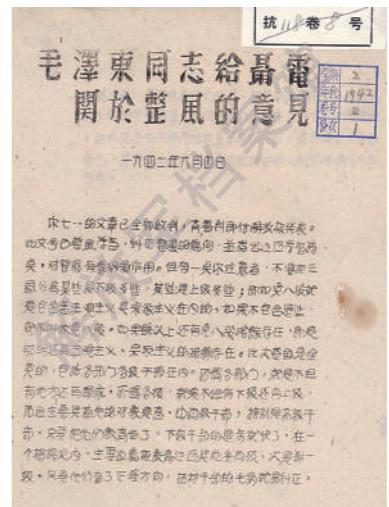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试想，如果上头存在贪图虚名的形式主义，下面怎能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如果上头盛行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下面怎能能做到同心同德、团结一心？如果上头滋长贫困安逸的享乐主义，下面怎能能做到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如果上头蔓延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下面怎么能做到节俭朴素、永葆本色？

“躬行者，政之始也。”领导干部在各个方面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新征程上，面对攻坚百年、使命催征的考验，面对政治整训纵深推进的考验，迫切需要党员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令行、以身教作榜样，带头做、带头做，既领之、又导之，切实以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持续推动形成弊绝风清、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档案

抓住“关键少数”的思想见证

■王溪



1942年8月4日，毛泽东关于整风的意见给聂荣臻的电报。

解放军档案馆藏

延安整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重点放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身上，通过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群体，带动全党风气转变。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整风“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因为“犯思想病较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部分高级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只会引用经典著作和诗句，不会结合中国实际解决质量问题”，甚至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对联，辛辣批判他们脱离实际的学风。

1942年8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整风的意見》，以电报形式发给聂荣臻。电报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門各级干部在内。所謂各部門，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謂各

級，就是不但有下級還有上級。而且主要與首先的對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別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們教育好了，下級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强调“要抓紧党政军民學各方面高級干部的學習領導，克服住他們中存在的不正三風殘余。我們在延安亦是特別抓紧高級的學習，着重鍛鍊與反省自己”。

电文清晰体现了毛泽东在领导整风运动时的策略：首先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他们集中精力研究关乎全局的路线问题，从思想根源上辨明是非；其次是运动开展具有阶段性，避免一哄而上、急于求成可能带来的混乱。实践证明，抓住“关键少数”，通过以上率下、示范带动能够有效解决党内突出问题。这份电报，对整风运动后续的有序开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王近山：逢敌亮剑 身先士卒

■雷从俊

为将之道

电视剧《亮剑》虽播放有年，剧中“李云龙”的艺术形象却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剧中，讨论作战事宜时，他关于“亮剑”精神的发言豪气干云：“军人要有股气，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决不含糊！”

开国中将王近山，正是“李云龙”的艺术原型之一。

“其实，父亲王近山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一直是‘亮剑’精神的践行者。抗日战争时期，在韩略村伏击战中，他以上率下、猛打猛冲，指挥部队取得重大胜利。战后总结时他强调，指挥员要敢于‘亮剑’，王近山之女王媛媛的话，把我们的思绪引入烽火硝烟的抗战岁月。

1943年10月，时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的王近山，接到命令：率部火速奔赴延安，执行护送干部、扩编部队及保卫陕甘宁边区与党中央的重任。王近山即率该旅16团赴延安。

途经山西洪洞县韩略村附近时，他们发现一支日军精锐部队迎面而来；侦察敌情之际，又获悉不远处我军一部遭日军围困。王近山认为，如果伏击这股敌人，既可吃掉这块“肥肉”，又可为我军解困。大敌当前，来不及请示，王近山当即下达战斗命令。他一边巧妙部署兵力，一边组织群众支援配合。我军依托有利地形巧妙设伏，迅猛突袭。

战斗持续约3个小时，歼敌军官120多名，含1名少将旅团长、6名联队长，而我军伤亡轻微。战后才知道，这股敌人是由日军中高级军官组成的“战地观战团”，他们在韩略村刚一露头，就被八路军消灭。战后，王近山在干部会议上进行战斗总结。他说：“合格的指挥员，既要闻令而动，又要主动寻机，敢于亮剑！战争之道，贵在‘手快打手慢，有备打无备’。”后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指挥员要敢于亮剑。”

“父亲到达延安后，想到未经请示就主动发起伏击战，他做好了接受批评甚至处分的准备。他正要写检查，没想到却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接见。”王媛媛说。

韩略村战斗的胜利意义重大，被《解放日报》誉为“敌占区伏击战的光辉典范”。王近山率部抵达延安后征尘未洗，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称赞：“我早就听说红四方面军有个‘王疯子’，如今已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了不起呀！这次韩略村伏击战就说明你很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了个漂亮仗！”

“王疯子”的绰号由来已久。王近山15岁加入红军，在入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他和战友陷入敌人包围。他提刀挥枪勇猛冲锋，子弹打光了便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死死抱住敌人一同滚下山崖。敌人被摔倒了，王近山也多处“挂花”，身负重伤，险些牺牲……王近山那股不要命的劲头令人印象深刻，战友们送他一个绰号“王疯子”。长征时期，王

近山在一次次战役战斗中，作为基层指挥员屡次冲锋在前，“王疯子”更是声名远扬。

“在延安那次接见中，毛泽东同志勉励我父亲：‘你还年轻，前途远大，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掌握更多的革命理论，这样将来才能指挥更大的胜仗。’”王媛媛说。后来，在毛泽东的教导下，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首长的精心培养下，当年的“王疯子”不仅保持了身先士卒、勇猛顽强的品格，也在不断学习中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知识修养，增强了军事理论底蕴，逐步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

抗日战争中，王近山率部参与了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长乐村战斗、七亘村战斗、韩略村战斗、谷台山战斗及著名的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参与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襄樊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役战斗。这些战役战斗中，“王疯子”将敢打敢冲、以上率下、身先士卒的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身教胜于言教。王近山职务越来越高，但敢于亮剑、冲锋在前的作风从来没有变。他的过硬作风和战斗精神，感召带动着所率部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大家都说，“王疯子”带的兵，跟他一样勇猛。

1946年9月，在定陶战役的大杨湖战斗中，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的王近山，面对国民党部队6倍于我的兵力，挺身而出，主动请缨。他

按照上级部署，利用有利地势，率部边打边撤，诱敌深入，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拿下大杨湖，生擒国民党中将师长赵锡田。战斗中，王近山将指挥所设在距敌人仅300米的地方，随着战况推进，持续前移，从旅、团指挥所一路深入尖刀营。有人说，“以行动代命令”是王近山带兵打仗的精髓。而身先士卒的行动，对于指挥员而言可谓“亮剑”精神的生动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王近山奉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率部与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进行殊死较量。上甘岭战役中，王近山把指挥所设在阵地附近，用望远镜抵近观察，不仅把命令下达到军部，还常常指挥到师、团，甚至直接指挥连、排、班作战。在惨烈胶着的战斗中，作为一线指挥员的王近山有时几夜不眠不休，战场的每条消息、每个细微动向，都牵动着他的神经。在43天的鏖战中，他和战友们以鲜血与生命“熬”出了殊为难得的胜利，打贏了这场重要的防御战。敌人领教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顽强，也领教了“王疯子”的厉害。

“今年是父亲诞辰11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将近半个世纪了……”王媛媛说。硝烟虽已散去，战争却从未走远。回望王近山将军的战斗历程，他传奇的战斗经历、敢于“亮剑”的血性胆气，他靠前指挥的身影、以上率下的作风，都给人以启示，激励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续写新的荣光。

岁月荣光

第一个冲锋

■李正

第一个冲锋
身影跃出战壕
阵地上响起“跟我上”的呼号
那紧攥的拳头，高举的手枪
俨然就是一方魂孔
把攻击的目标紧紧锁住
调动起所有战斗的力量

第一个冲锋
无论什么时候
都第一个答“到”
“跟我上”的信念
早已化成无言的行动
像一束光，一面旗
把黑暗与阴暗驱散
让前进找准方向

第一个冲锋
就是“跟我上”
澎湃的队列如潮
每一步都是划破战场的锋刃
每一声都聚拢着向前的信仰

同志。起义之初，一些军官的思想不稳定，伯坚同志苦口婆心地和他们谈话，哪里出了问题，他就到哪里去做工作。在教育改造部队面临抵制和出现问题时，他又深入部队，与各级政治委员一起，找各级军官谈心，做稳定部队的工作。

伯坚同志非常重视部队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娱乐工作，在红五军团创办了《猛进报》和猛进剧团，举办文娱训练班；在部队建立军人俱乐部，活跃部队生活。在行军打仗期间，伯坚同志率领政治部鼓舞部队士气，宣传组织群众。虽然战争那样残酷，但红五军团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精神，充满了勃勃的生机。这些都是与伯坚同志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

后来，我离开了红五军团，听说伯坚同志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没能随红五军团长征。他留在赣南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不幸被捕。伯坚同志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英勇牺牲。

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有一个《戴镣铐》的悲壮歌舞，就是根据伯坚与夏明翰在狱中的表现和他们的诗文改编的。

（作者曾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文章摘编自《来时的路：亲历者讲述红色故事》“古田会议”卷，有删节，原标题为《红五军团的诞生》，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



铁军忠魂(雕塑，“人民必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展”作品)

吴为山作

刘伯坚在红五军团

■萧劲光



口述

1931年12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参谋长、中共党员赵博生和第73旅旅长董振堂，与第74旅旅长季振同、第1团团长黄中岳等经过共商，率全军1.7万余人举行了起义，即宁都起义。苏区人民热烈欢迎起义部队，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亲自前往固厚迎接，安置部队，当即宣布军委命令，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当日，由刘伯坚起草了《宁都暴动宣言》，经中革军委正式向全国广播，红五军团就这样诞生了。

1.7万余人、2万余支枪，这支部队如果改造得好，将是保卫根据地的一支红色劲旅；如果改造得不好，也会给苏区带来很大麻烦。为了做好统战工作，教育改造

好这支部队，军委选派一些有部队工作经验，特别是有改造旧军队工作经验和出国留学过的同志去担任各级政治委员。

1931年12月18日，军委任命我为军团政委，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我与刘伯坚可以说是老同学了。他在宁都起义和改造起义部队中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伯坚同志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底，他转入党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那时正好我也在“东大”。

大革命时期，伯坚同志受党的委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政治部副部长，主持西北军的政治工作。他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传播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培养党的干部。他才华出众，又很谦虚谨慎，不仅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器重，也得到一些西北军高级将领的敬慕和下级军官、士兵的爱戴，在西北军中播下了革

命的火种，威信很高，影响很大。大革命失败后，伯坚同志去苏联，我与他再次成为同学，一起在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军事。